

草原珍宝档案



辽代釉陶三彩套盒

□郑承燕

辽代釉陶三彩套盒(如图)由两件浅盘组成,高4厘米,口径15厘米。浅盘为子母口,浅腹,八曲花瓣形高座,高座表面装饰印花牡丹花叶纹。浅盘大部分上施黄釉,牡丹花上施白釉,牡丹叶上施绿釉。辽代釉陶三彩套盒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。

辽三彩即辽代生产的低温釉陶器,不仅限于黄、绿、白三色釉,绿、黄单彩器也很有特色。辽代釉陶器的生产,既有专门的窑场,也有专烧釉陶的窑炉。辽代窑场,目前发现有赤峰缸瓦窑、林东南山窑、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等处。其中林东南山窑位于辽代上京临潢府故城西南1公里处,是专门烧制三彩釉陶的窑场。这里生产的三彩和单色白釉、黄釉器,胎质较细,均作淡红色。烧造时,胎体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,制坯后先入窑素烧,再施彩釉二次焙烧而成。素烧的温度达1120左右,胎质瓷化,吸水率降低。由于釉色单一,采用填色技法,釉色界限分明,釉面很少流淌。在装饰风格方面,主要以印花为主,少见绘花和划花等装饰。在构图上,讲求对称,纹饰较为繁缛,满布整个空间。

辽王朝统治时期,我国陶瓷手工业经过隋唐的大发展,形成了“南青北白”的生产格局,进入到一个瓷业昌盛、窑口林立、窑瓷更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。辽三彩在继承唐三彩烧制工艺的基础上,有所创新和发展,反映出契丹族特有的民族风貌和文化特征。辽代陶瓷器以其独特的造型的装饰特点,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1970年夏,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村群众因修渠取石发现了一座辽墓,翁牛特旗文化馆、昭乌达盟(现赤峰市)文物工作站随即派员进行了发掘。此墓为石室木椁券顶单室墓,葬式为合葬,男女墓主人头东脚西,仰身直肢,脸部均覆盖铜面具,应为辽代中期的契丹贵族。墓中共出土此式套盒四件,其用途当与汉族漆器果盒相似,是辽代中晚期三彩器精品。

杂项



清代紫檀状元箱

□李喜庆

这件状元箱(如图)以紫檀木为材料,呈规则长方形,长24厘米,宽13.5厘米,高7.5厘米。箱体四面垂直成90度角,每角之上包铜片,箱盖四角饰如意纹铜包角,箱正面装饰有铜质朵云形面叶及如意云朵拍子,可挂锁。两侧有铜质提手,方便搬运与携带。此状元箱造型质朴沉稳,简洁端庄,通体光素,毫无装饰花纹,尽显木质本身的独特纹理,纹路清晰,深浅不一,打磨精致,纯净自然,线条流畅优美,给人以文静、柔和的感觉。

状元箱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书包,用来装书籍、笔墨、衣物、盘缠、信件和票据,是古代学子们必备之物。之所以叫状元箱,是取状元及第之意,祈盼子孙日后能金榜题名,高中魁首。据说,状元箱的原型出现于汉代,是以竹片或藤苇编成,专门用来盛放书籍衣物的方箱,名为篋筒。不过,竹子、芦苇制作的箱子,由于受材质的限制,箱内物品易生虫蛀、鼠咬及霉变、受潮,一旦保管不善,很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。到了明代,大量的名贵木材从东南亚经海运进口,状元箱也从中受益,改为硬木制作。状元箱的材质一般比较好,甚至很名贵,民间藏家中用黄花梨、小叶紫檀、金丝楠、鸡翅木等制作的状元箱不在少数,此类箱上一般还装有各类附具、饰物,使其实用美观,增加了艺术价值,有的箱体上面还刻有纹样图案和诗文警句,以砥砺品行,致祥纳吉。明清时江南读书风气很盛,状元箱风靡一时,除了男子用外,不少书香门第的女子也要带着状元箱出嫁,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。

这件紫檀状元箱是我在浙江金华旅游时淘到的。许多年前,我到浙江金华华金旅游,饱览了金华仙华山、横店影视城等胜景,品尝了金华火腿、金华汤包等美食,最后一天,旅游自由活动,游客大多选择了到购物市场购买自己心仪物品,而我却选择了到古玩市场逛逛,最终淘到了这件文化韵味浓厚的状元箱。

(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)



元代大画家任仁发的

□周惠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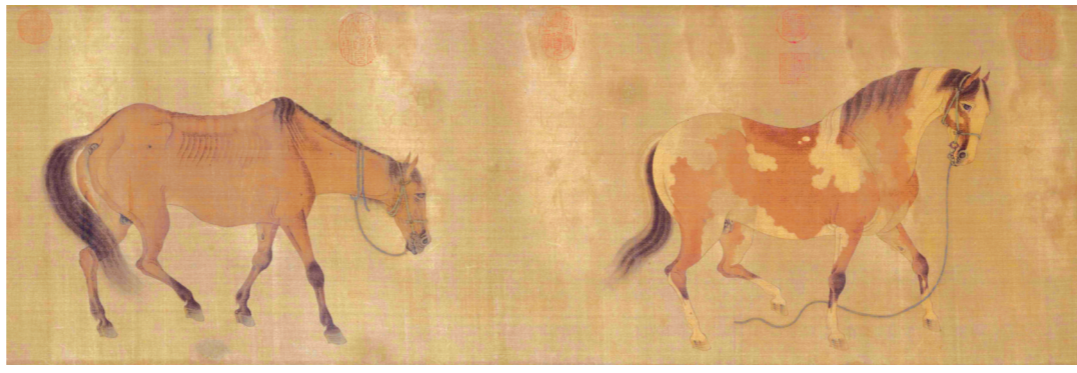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绘画盛行尚古之风,这不仅在钱选、赵孟頫等典型的文人画家身上得到充分显现,而且也体现在了以任仁发为代表的既是画家又为官员的人物身上。

任仁发(1254-1327),原名霖,字子明,号月道人,上海青浦人,精通水利兴修,历任都水庸田使司副使、中宪大夫、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等职,是元代一位集水利专家和书画大师于一身的杰出人物。其水利方面的成就以建造现位于沪上志丹苑的元代水利工程(赵浦闸)遗址为今人所称誉,其书画方面的造诣可比肩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。

任仁发才华横溢,擅学专门,政务之余暇喜好诗文书画,书宗李邕,画学李公麟,秉承唐宋重视写实的传统,且有新的突破和发展,是继唐代画家韩干之后又一位以鞍马画著称的绘画大师,早年曾作《照春天马》、《渥洼天马》等画。任仁发的鞍马形象,线条流畅,设色明快,于唐人鞍马画,花团锦簇,丽一格,作品用笔精湛,着墨细腻,线条流畅,设色明快,丰肥而不臃肿,写实而不板滞,工细不失英姿,为识者评为法备神完、笔意独得。

任仁发的传世作品有: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出圈图》、《二马图》、《张果见明皇图》,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春水凫鹭图》,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饮中八仙图》、《贡马图》、《横琴高士图》、《秋林

鞍马之劳



(图1)

晒宝

□魏咏柏

数月前,我在古玩店偶遇一件枕头顶刺绣品(如图),方形,长宽约15厘米,品相完美鲜艳,实属难得。于是,我与店家一番讨价还价,最终将此物收入囊中。

人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,所以入寝没有枕头一般是不可能的,可见枕头与人类生存关系之密切。据考证,中国使用枕头的历史十分久远,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诗经《陈风·泽》中便有“辗转于枕”的句子。成语“高枕无忧”出自《魏策》。《魏策一》中记载:“无楚韩之患,则大可高枕而卧,固必无忧矣。”可见当时枕头使用已经十分普遍。

在我国古代,人们使用的枕头材质非常多,例如常见的有瓷、陶、木、竹、石、布等。在北方,因气候寒冷人们大多喜欢使用布枕。布枕一般是用布缝制的,其型不外乎方、扁、圆几种,更多的还是长方形六面枕。枕瓢子一般以植物的叶、花、果或果壳填充,用起来很方便,也很舒适,既软乎、又温暖,主要填充料有荞麦皮、草、艾蒿叶、茶叶等。经几位资深藏友鉴定,我收藏的这件

刺绣品应为清末民国时期的物件,是用来制作枕头顶用的,而这两片刺绣就是枕头顶两侧的用料,俗称枕头顶。刺绣枕顶多用作长方形枕头的两端,旧式的枕头顶多用土蓝布缝制,枕身较长,两端为方形,可以装饰刺绣的枕顶,摆在炕上非常美观。刺绣枕顶的图案大多



带有吉祥的寓意,题材十分广泛,有山水、花鸟、草虫、走兽、人物、文字等。

我收藏的这件枕头顶刺绣的内容就是花鸟,刺绣工艺精美,栩栩如生,布料和绣线的颜色非常艳丽,保存得非常完整,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。

石器



石钺

□臧敖

这件石钺(如图),宽9.3cm、高10cm,由龙乡博物馆收藏。

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,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,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。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,兼以牧、渔、猎并存。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纹陶器共存,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。红山文化年代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~前3000年。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中:烟叶形、草履形的石耜,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,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

石刀、石耜、有肩石锄、石磨盘、石磨棒和石铲等。

据龙乡博物馆馆长臧洪贵介绍,该馆珍藏的这件石钺为香灰白色石,上面密布黑色斑点,石质极细腻。通体打磨光滑,制作规整。纳端较厚,磨制平整,距纳端两侧较近有两个对钻小孔。在两小孔其下的正中有一对大孔,孔经过磨饰而显得光滑,大孔之下又有一中孔,且为单向钻孔,可见钻孔痕迹,推测古人意在区别钺的正反面。正视此钺如同一个人眼,眼鼻口俱全。可见红山古人的匠心独运。钺的特征是纳端窄而刃宽,刃部呈弧形,此钺为红山文化晚期的作品,制作极其规范精致,是为氏族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执掌权力的象征物。

民俗



银质抓周盘

□王继军

图中所示为一只清代银质抓周盘,直径为5.8厘米,边厚0.3厘米,重14.5克。从正面看,该盘正中央为一面内凹的圆镜,左右两侧各为剪刀和一本万年通书。圆镜的上方,分别为盒装盘秤与一把老式直尺;下方的算盘小巧别致,连每一颗珠子都可拨动。所有物件均具体而微小,且都是用焊接的方法经过精心布局排列,一目了然。从反面看,正中央为太极八卦图案,周围则依次为鼠、牛、虎、兔等代表着生肖的十二生肖动物立体图,在它们的外围,分别对应着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十二地支的阳文汉字,间距得当,工整清晰。端详整件抓周盘,可见其工艺精美,包装浑厚细腻,光线下依然银光灿灿,令人称奇。

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“江南风俗,儿生一期(即满一周岁)为制新衣,盥浴装饰。男则用弓、矢、纸、笔,女则用钗、尺、针、缕,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,置之儿前,观其发意所取,以验贫贱愚智,名之为试儿。这是有关抓周的最早文献记载。因此,抓周又称试儿,是一种在小孩周岁时预先卜儿前途或性情的习俗。通常在小孩面前放置六样不同事物(也可能是6的倍数),取其“六六大顺”的吉祥含义。然而,让刚满周岁的婴儿抓取剪刀、算盘之类的易伤之器存在风险,聪明的古人便

发明设计出抓周盘来。

就大小看,这件抓周盘也就婴幼儿的巴掌大小,到底如何使用呢?在宾朋满座的抓周宴上,周岁孩童穿戴一新,坐于桌前,双眼被红绸布蒙住。外婆郑重地将抓周盘放到桌上,此时母亲将孩童的小手引近,大家屏息凝神,看小手中最先接触到什么,便有相应的祝福语。触到圆镜,说的是“明镜高悬公道”;触到剪刀,便说“心灵手巧”;触到万年通书,则说“知书达理中状元”;触到盘秤,则说“知知识重有分量”;触到尺子,便是“知长知短分寸”;触到算盘,赞其精打细算发大财。更为有趣的是,抓周盘还有公母之分,公的用于男孩,圆镜为凸镜,算盘位于上方,母的用于女孩,圆镜为凹镜,算盘位于下方。其凹凸代表阴阳,算盘位于上方,意为长大后管理商海之上的大财;位于下方则为女孩长大了即使操持算盘也只能理家中厨下的小财。个中寓意,颇具重男轻女的时代烙印。

宋代吴自牧的《梦粱录·育子》篇中出现的详细描述,说明唐宋时期抓周之风已传遍全国。清代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九回提到:“那日你家父母在炕上摆了许多的针线刀尺、脂粉钗钏、笔墨书籍、算盘,邀我进去,一同看你抓周儿,可看作抓周一词始现民间的例证。至于钱钟书的名字来自抓周时抓了一本书,则更充满古老民俗的趣味。”